

身体与政治

——关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关键词:娼妓;现代性;身体政治

摘要:本文认为,美国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把娼妓问题置于上海现代化的复杂环境中进行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有关妓女的历史记忆和知识形成的研究上,勾勒妓女肖像,并通过妓女这个媒介探索有关性、社会性别、政治权力、文化转型、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消费主义如何通过异常的女人身体中介获得表现。这正是贺萧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她对中国妓女研究的贡献,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C913.1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6)01-0078-03

Body and Politics

——Looking at *Dangerous Delight*——*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Shanghai in the 20th Century*

CHEN Xi ao-lan

(Faculty of Arts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Keywords: prostitution; modernity; body politics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Dangerous Delight—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Shanghai in the 20th Century* by American scholar, Gail B. Hershatter, has located prostitution in the midst of complex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n Shanghai. The book focuses on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knowledge building of prostitutes. While drawing portraits of prostitutes, the book highlights how these women's bodies embodied reflections of sex, gender, political pow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consumerism. This style of writing is uniquely presented by Hershatter and also is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rostitution. It, however, also has limitations.

美国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2003)以下简称《危险的愉悦》是西方众多研究中国妓女问题、卖淫问题专著中的一种。贺萧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末的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语境,研究在中国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妓女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边缘群体,一种无法消除的“必要的罪恶”,在100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卖淫形式、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及与外部权力控制关系的演变。一方面探讨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对卖淫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论述了卖淫业在上海的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开拓了中国妓女研究的新视野,并从另一个层面深化了中国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文化的研究。

一、作为妇女史、社会史组成部分的妓女史

自高罗佩以来,西方关于中国卖淫问题的研究一直就被看作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的视角”,透视中国人的性及隐藏在性问题背后种种范畴的一面镜子——“一面独特而扭曲了的镜子。”^{[2][3]}同样,贺萧《危险的愉悦》也把这面镜子

看作透视特定期中国社 会变迁和群体情感演变的一个媒介,以此来了解中国人的性、身体、欲望、情感以及中国的权威机构对这一切的控制问题,探讨女性身体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中承担的角色,种种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描绘与塑造。因此,妓女的历史,也即女性身体作为货品公众化、商品化、话语化的历史,它是中国社会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妇女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妓女作为妇女的另类或者他异群体,她在某一阶段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妇女的地位、婚姻、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中国本土研究中国妓女、卖淫问题的著作相比,本书尽管是以妓女为研究中心,但所要探讨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妓女问题本身,而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各个方面。在贺萧的著作中,卖淫是被放在上海城市史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并把她置于上海城市发展、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民族主义话语及对于性问题的普遍关注的交叉重叠的复杂语境中进行研究。贺萧利用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医生及旅游者的写作,以及大

作者简介:陈晓兰(1956-),女,比较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量的报刊、文学作品(主要是通俗作品)、花界指南等等,勾勒出不同时期上海卖淫业的结构以及运作情况,上海妓女的人数、社会来源、地缘分布、妇女贸易中的欺诈与暴力、妓女最终的命运、性病与社会健康、不同社会阶层对卖淫的态度等等。贺萧把卖淫业的变迁与城市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了上海妓院形式上的等级制,中高等妓院的规矩和脱离卖淫业的途径,普通妓女的状况,大众化的、变相的卖淫业以及妓女的地缘分布。并把妓女卖淫形式的等级制和地缘分布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这看作中国社会结构和需要的反映。贺萧认为,高级妓女,作为旧中国妇女被彻底排除于公共空间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独特例外,弥补了正统婚姻家庭中男性的情感缺憾。但是,随着妇女的解放以及卖淫业的大众化、市场化,传统意义上的高等妓女群走向解体。19世纪末,上海的卖淫市场已从一个由一小群高级妓女主导的、以满足19世纪城市精英的需要为目的的奢华市场,演变成为一个为城市工商阶级中日益增多的未婚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市场。“大众化、商品化的妓女市场的兴旺是现代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但妓女又成为引领现代都市风尚的先锋,妓院成了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气概的重要场所……同妓女交往可证明自己是都市中人,很文雅,懂得礼节,而妓女则成了文明礼貌的仲裁者。”^{[11](P120)}妓女成了都市现代化的一个符号。

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死灰复燃卖淫现象,贺萧一方面概括了这一行业的地缘分布状况及卖淫方式,并审视了官方和非官方对改革时期卖淫现象的分类、管理办法以及公众、学者对这一现象的不同理解,并分析中国当代现代化语境中关于妓女问题的各种叙述和论争。认为,在当代关于过去的再构造活动中,再次利用了娼妓,娼妓问题不断被重构,在对过去的认识中形成一个重要的符码。

二、想象性重构——妓女的被讲述史

贺萧《危险的愉悦》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研究重心的转移。她不像许多国内外研究中国妓女的学者那样,以探索历史事实真相为自己的目标,为中国妓女重述她们自己的卖淫史,而是将焦点集中在有关妓女的历史记忆和知识形成的研究上,审视妓女描述本身,也就是说,对有关妓女的话语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妓女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妓女的讲述史。法国学者安克强在谈到贺萧的这部著作时说:“贺萧的书是对民国时代的作家和文人学士所做的有关卖淫的陈述进行研究,而不是提供一部有关这种现象的社会史。”^{[12](P14)}

受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影响,贺萧对以往“历史复原”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持怀疑态度,并对其局限性作出了思考,体现出鲜明的新历史主义倾向。正如贺萧在该书“导言”中所说:“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13](P10)}娼妓同任何一个社会中下层的、边缘的沉默者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

记载自己的生活,她们很少直言说。正如贺萧所说:“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14](P3)}同许多有关妓女的著作一样,贺萧的这部著作也是根据记录妓女生活并与之相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文献资料——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录、肖像画、小报闲话专栏、市政法令、庭审记录、取缔娼妓业的争论、医生关于性病的分析、统计数字、买卖妇女的报道等等完成的。但贺萧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5](P5)}事实上,在整部著作中,可以看到贺萧无时不为叙述、虚构和事实所困扰,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话语对身体、对性的强大的建构力量,文化中介在性经验的构筑、形成道德评判和采取管理检查措施中所起的作用,贺萧甚至无限夸大了这种作用。她试图区分妓女的历史事实与文献陈述、文学虚构中的影像,但这种区分在她看来是徒劳无功的。贺萧透过种种叙述,勾勒出不同时期人们对妓女的想象以及其中所传达的隐秘感情。

三、作为中介的女性身体

在《危险的愉悦》中,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行业,而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里的中上层阶级藉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和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16](P4)}因此,在各种有关妓女的陈述中,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意义,妓女变成了一个灵活的象征符号,被反复使用,或者用以寄托士大夫的文化情怀和对现代政治的态度,或者借此表达现代知识分子复杂而矛盾的现代体验和对现代化国家的憧憬。贺萧试图透过种种关于妓女、身体、性的话语,勾勒出众多叙述中的妓女肖像,并通过这些肖像探索言说者对于妓女的态度,所表达的个人的情感、焦虑和幽思。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妓女问题的陈述所蕴涵的象征意义,通过妓女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性的意义、其他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属感”等问题的研究,探索社会性别、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消费主义、政治权力如何通过女人的身体——异常的、不正常的身体——这一中介获得表现。这正是贺萧《危险的愉悦》的独特之处,是她对中国妓女研究的贡献,但同时也是其局限所在。

在20世纪前20年出版的各类有关妓女的写作中,妓女的形象因言说者的不同而不同。对高等妓女的浪漫怀想和对现代妓院的恐惧并列,充满行业花招诡计的现代妓院与感伤情怀中忆起的未被商品化的名妓圈子恰成对照。在高等妓女事略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上等人家的女子因家道中落而沦落风尘,把自己良好的家教和待人接物的修养带到妓院中,使妓院充满了诗情画意。“落魄的高等妓女”这一主题,表现了日益消亡的士大夫阶层对于往昔的怀念。“中国高等妓女”作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构件”,通过大

肆渲染她们精湛的艺术技艺和在性方面的妩媚、优雅、含蓄，表达“这个中国是亘古不变的、异域情调的、优美雅致的，在表达性欲之精深微妙方面”与西方人完全不同。^{[1][P104]}但同时，在各种关于现代妓院的表述中，妓女也是被作为危险的城市的象征，成为表达20世纪中国的危机这个大叙述中的一个要素而出现的。在20世纪早期的各类指南书、小报、回忆录和黑幕小说中，大肆渲染妓女的花招和伎俩，把现代妓院刻画为一个“难以琢磨的阴险场所，男人来到此地即使不败了身子，也会折损钱财或丢掉自尊”，贺萧把这理解为“对大都市环境中的险情发出的警告”。这些故事反复讲述了不受正派婚姻和情感约束的女人对男性造成极大的危害；标志着传统的社会性别安排的瓦解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与此同时，对妓女、嫖客、买卖人口、法律、性病的论述中，表明妇女被作为牺牲品，与家庭分裂出去，被推入到上海的城市社会中，被人拐卖或被骗入娼门，城里人表面无害其实心地邪恶，这些叙述同样在讲述着上海的危险性。^{[1][P198]}同样，传教士、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也把“上海描写成一个危险之地，天真未凿的乡下妇女在这里接触到了中国那张既有吸引力、又十分危险的现代面孔。”^{[1][P215]}

在贺萧看来，与乡村家庭走向陌生的城市，与娘家失去联系，或者从家庭中裂变出去从事卖淫的受害者形象，作为20世纪中国妓女的最普遍的故事，成为民国时期表达政治危机的一种涵义极其丰富的象征语言。在各类叙述中，娼妓问题往往与民族危机和追求现代性联系起来，买卖妇女儿童，“成为社会混乱的突出表征，它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内外批评家心目中的国家形象”。^{[1][P205]}中国的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外国的传教士及社会团体都把娼妓现象看作中国国力衰弱、文化贫弱的标志、道德衰落的象征，他们同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讨论上海的娼妓问题，把它看作是危害全民身体健康和道德风化的恶俗之源。中国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五四批评家在社会性别关系与国力问题相重叠的层面上探讨娼妓问题，把娼妓业看作中国危机深重的一个标志，是对人类价值的亵渎，认为“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1][P258]}而无法控制的性病危及大众健康，使民族衰弱，国民道德滑坡，男女关系混乱，妇女人格受辱，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必须加以取缔。他们提出禁止买卖妇女，送妓女公费学习技能，自成家庭，这成为新中国妓女改革运动的先声。他们分析娼妓现象的生物和社会根源；“不仅从改善妇女地位，而且从更大的政治目标出发，要求男人们改善自

己的行为，而好行为有一个方面就是心甘情愿不再嫖妓。”^{[1][P248]}早期的改革者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憧憬是，娼妓业有井然有序的管理检查体制。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娼妓业必须列为改革的对象。

作为一个海外学者，贺萧对中国妓女问题的研究必然受到其本土文化、问题意识、关注的焦点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正如安克强所说：“西方研究卖淫史的学者所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论述官方当局在某些职业团体（如医生），或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各种控制系统；由这些控制系统所引发的反抗、抵制运动。”^{[2][P3]}这是西方文化中关于性与身体的界定与控制传统的产物。权威机构——如警察、司法系统、医院、市民团体、宗教组织——一直对卖淫实行管理控制与查禁。^{[2][P14]}同样，贺萧在其著作中也历时地考察了每一个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权威机构对于卖淫业的控制和管理及其效果。她指出：“从20世纪20到50年代，上海的历届政权都把她们看作危险地漂离了正当的社会位置，既是一个纷乱无序的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造成这种社会纷乱的成因。对于娼妓业的管理检查制度，向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权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城市生活新疆界的大工程的一部分。”然而，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只有新中国才成功的消灭了娼妓业。^{[1][P304]}作者比较分析了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对于娼妓业的管理及其效果。

四、局限：虚构与事实

《危险的愉悦》深入到以往中国娼妓研究鲜有涉及甚至忽略的问题，即妓女话语中的权力问题与管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其中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安克强所说：“历史并非简单地是一项虚构的工作，历史学家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充分和客观的有关死人的情况（包括性格、思想、价值）并以此为自己的目标。”^{[2][P1]}显然，贺萧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都表现了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她关于中国妓女的研究更是一部中国妓女的叙述史的研究，她不仅勾勒出各种叙述话语中的妓女，更主要的是勾勒出了妓女讲述者的幽思。

另外，贺萧也似乎无法避免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的局限。贺萧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将所研究的对象无限政治化。娼妓业毕竟只与一个国家国民中的少数人发生关系，而有关妓女的各种叙述也只是每个时期宏大叙述中的一些插曲，甚至游离于正统话语之外，那么，将少数人的体验夸大为民族体验，将妓女的叙述夸大为民族危机的象征，其“微言大义”之中总有些危言耸听之嫌。

[参考文献]

- [1][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2][法]安克强著，袁雯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宓瑞新